

采用散文/随笔讲述你我经历/熟悉的大学历史、故事、人物及精神,这一写作方式,很难说起源于何时何地,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应该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契机。此举的最大特点,在于有效地沟通了“文”与“学”——这里所说的“学”,特指教育史、学术史与思想史。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“任意而谈、无所顾忌”的“语丝文体”,也可以从1979年创刊的“以学识为根基,以阅历、心境为两翼,再配上适宜的文笔,迹浅而意深,言近而旨远”的《读书》杂志说起;当然,还可以像我曾在文章中提及的,以1988年刊行的两本有关大学的“怀旧”图书——中国文史出版社的《筚路蓝缕诵读切》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《精神的魅力》作为切入点。而随着《北大旧事》(陈平原、夏晓虹编,北京:三联书店,1998)、《北大往事》(橡子、谷行主编,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1998)的出版与热销,集合众多零散的老大学师生的私人记忆而成书,这一编撰策略,得到了广泛的认同。紧接着,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组织了“老大学故事丛书”和“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”;随后出版的“中华学府随笔”丛书(四川人民出版社)以及“教会大学在中国”丛书(河北教育出版社),走的也是这条路——谈论大学的历史,不再局限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,而是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(参见陈平原《文学史视野中的“大学叙事”》,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)。

那些连着青春胎记的大学记忆

陈平原

其实,“追忆似水年华”,从来都是文人学者写作的重要动力。而对于上过大学或在大学工作的人来说,大学记忆连着青春胎记,历经岁月的酝酿与淘洗,不断地发酵与积聚,终于在某个特定时刻喷薄而出。这种状态下,很容易催生出生气淋漓的好文章。假如你所谈论的大学故事与人物,恰好能折射时代风云,或凸显某种精神境界,那就更有可能赢得满堂掌声。

为了便于读者进入规定的历史情境,也为了保存某些难得的时代气息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众多有关老大学的图书,大都会用插页方式,印制若干老照片。但那更像是图书的配件与装饰,编写者及出版社都不曾将其作为重要一环来认真经营。

这就说到约略与此同时崛起的另一种出版风尚。1996年底,山东画报出版社的“老照片”丛书一经推出,即以其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与回眸历史的新颖视角,引发了风靡全国的“老照片文化热”。如今,该社又别出心裁,策划“老照片”品牌的衍生品——“我们的大学”丛书,选取若干所具有悠久历史、在海外卓有影响的知名大学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,展现其人文历史与精神风貌。

“老大学”丛书追求的是“文”与“学”的配合,“老照片”丛书则着力于“图”与“文”的融通,如今这两条线交汇起来,成就了“老照片·我们的大学”丛书。这么一来,可最大限度地兼及图、文、学三者,实在可喜可贺。

天下事,有得必有失,追求五彩缤纷,那就无法执着与凝重。好事你不可能全都占尽,比如知识系统或思想深刻,便非本丛书的工作目标。某种意义上,形式就是内容,既然选择这么一种三合一的图书风貌,除了必不可少的诚实与可信,“好看”应该放在第一位——无论人物、文章还是图像,都必须生动、活泼、有趣。说到底,这不是一字千钧的学术史,也不是正襟危坐的教科书。

如此“好看”的文化读物,拟想读者可不仅仅是各大学的校友,更包括所有对中国大学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感兴趣的读书人。

(本文为“我们的大学”丛书序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几年前的深秋,我在住宅区的垃圾箱旁边捡到了一盆芦荟,它耷拉着脑袋仿佛冬眠似的,叶子无力地低垂着,叶面失去了光泽,周身了无生机,更碍眼的是栽芦荟的那个花盆,破得只剩下半个,显然是哪位花农嫌弃盆碎了才丢弃的。当我第一眼望见它时,便爱怜于这被主人抛弃的“弃儿”。于是,毫不犹豫地把它抱回家。

老伴找来一个空盆栽起来,把它搁置在位于阴面的窗台上。从此对它倍加呵护,按时松土、浇水、施肥,悉心照料。然而,过了几天,它似乎还没有从伤痛之中缓过神来。我失望地把它从客厅移到了阳台,不经意间又是半个月过去了。我知道,芦荟一般是夏末秋初开花,此刻正当时令。

一天中午回家,当我把阳台的窗帘拉开之后,眼前的情景把我惊呆了。它的叶片宛如翠色的碧玉,靓丽、清纯。橘黄色的花朵,含苞待放,生命旺盛而

老祠堂有一部历史书

富晓春

浙南文成梧溪有一座老祠堂——富相国祠,供桌上摆放着一部泛黄的线装中国历史教科书,静默如禅。32开形制略显小巧,却承载着两个甲子的岁月沧桑;书页间勾画圈点的痕迹犹存,宛如一位无声的老人,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荣耀。每逢庄重肃穆的祭祖大典,富弼的裔孙总会怀着无上崇敬之情,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将其捧起,虔诚地托举过头顶,行那庄严的三揖九叩大礼……

—

一直以来,此书由梧溪退休教师富锡金收藏。说起它的来历,其中还有一段渊源。

1966年秋,12岁的富锡金正蹲在祠堂里玩耍。彼时,民兵们正忙于清理“四旧”,一捆捆古籍被堆放在天井,即将付之一炬。突然,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册从书堆中滑落,掀开的书页上“富弼”二字如惊雷般击中少年的心。在梧溪,三岁孩童皆知,这位北宋名相正是他们的老祖宗。

趁着看管民兵不留意,富锡金迅速将书册塞进石头缝隙,随后又用脚踢地上的泥沙,将其掩盖。三日后的夜里,富锡金冒着被抓的风险,再次潜入老祠堂。当他的指尖触碰到书册时,少年剧烈的心跳声,仿佛要将这寂静的夜色震碎。

这本当年被视为“毒草”而遭禁读的书,自此成为少年阁楼里的秘密。在昏黄的煤油灯下,富锡金用双手轻轻摩挲着那久违的铅字,仿佛触碰到了历

史老人沉默的呼吸……

后来,富锡金考上了师范学校。离家的前夜,他将这本伴随自己成长的教科书,用油纸小心包裹好,藏匿于阁楼房梁之上、瓦片之下——隐秘处。尽管当年的他还不能完全领会教科书中的深刻意蕴,但老祖宗富弼显赫的名声,却如同一颗种子,深深地埋在了少年的心底。

这颗种子,在时光的滋养下,渐渐孕育,生根,发芽。

二

这是一本清光绪铅活字版的《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》。由浙江临安姚祖义纂辑,浙江山阴(绍兴)金为修订,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版,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五再版。所谓“最新”,距当下亦已百余载也。扉页上题有娟秀小楷“刘观焕”。为中国历史教科书卷三。

目次内容起自《宋太祖初政》,迄于《张居正柄权》,60篇课文串起宋元明三朝700年的历史风云。在《宋与夏辽和战》《仁宗守文》《宋臣争濮议》《神宗变法》四课中,赫然记载着先祖富弼的丰功伟绩。

《宋与夏辽和战》中富弼出使的故事,为课本略显呆板的铅字涂抹了鲜活的色彩。当年,宋仁宗因契丹提出的割地要求而寝食难安,宰相吕夷简却因忌恨富弼的贤能,恶意举荐他出使辽国。富弼以过人的胆识,挺身而出,与辽王展开多轮艰难谈判,最终成功说服对方放弃割地的要求,以增加岁币为代价,换来宋辽百年和平。

课文中所描述的“富弼至辽,反复辩难,力拒割地”,仅此寥寥数语,但在族人口耳相传间,却化作了更为生动的细节:赴辽



黄鹂两只 (中国画) 杨正新

国路途上,骤闻爱女病歿,先祖脊背挺如松终未回首,毅然决然消失于漫天风雪中;契丹营帐之外,他凭三寸之舌孤身奋战,貂裘肩头凝着的霜花,在清冷月光下闪烁如星……

还有《宋臣争濮议》中记载的君臣对话,也使后人人为之动容。

当王素提出“宦官宫妾不知其名者可为相”时,宋仁宗脱口而出:“非富弼莫属。”这种超越世俗认知的君臣相知,化作了简明扼要的历史结论:富弼以清德著闻,时称贤相。而在梧溪富氏族人的记忆深处,这是每年祭祖时,族老们必定会讲述的掌故——先祖在相位时,家中宴客竟无绛罗绸缎装饰,唯有竹器瓦盏,却令辽国使臣感叹:大宋真有人杰!

书是富锡金从老祠堂所得,有人猜测可能是富弼后裔上代祖传;又因扉页留有刘姓大名,故而也有人推测可能是南田刘伯温后裔馈赠。书页间红蓝笔圈点的痕迹虽已在岁月中褪色,却依然清晰可辨,这或许正是梧溪富氏的精神密码——藏在历史课本的铅字与族谱的墨迹之间,隐于故纸堆的尘埃与现实的人间烟火之中。

三

2012年深冬,富锡金卸下肩头冗务携家回到阔别多年的梧溪。当他重新

其,一世芳名。
粉蝶儿·木槿花
白日晨开忽如赫姿
竞秀,惜芳时、向朝阳
奏。怎匆匆、树一帜、只

九月花语

徐子芳



扬州慢·桂花
荣耀千门,小窗秋净,
桂园景意鲜澄。菊开梅妒煞,奈何寂红英。暑消去,
微凉送爽,玉阶新月,豆蔻
关情。护金黄,劳事人间,仙俗欢承。
十分雅气,俏无尘、媚笑盈盈。绽满
树娇黄,秋思漫解,沁润温馨。似在广寒
宫里,姮娥舞、翠幔匀轻,共青天、玉露何

一盆芦荟

赵炳庭

热烈。这不是应了那句“有意栽花花不发,无心插柳柳成荫”的俗语嘛,我的心一下子由喜欢它提升到爱上它了。这才意识到,能装饰屋子净化空气的它,还能室内增加一些色彩明快的绿饰,给居室平添融融情趣。

我是一个喜欢养花的人,退休后除了到菜市场买菜、接送孙子上学,其余时间就是精心侍弄花草。以前也曾在客厅放置过绿色植物,大的有朋友送的发财树,小的有自己选购的富贵竹、兰花、玻璃翠、长寿花等,这些此前曾在明媚阳光中逍遥过的名贵盆花,都因自己养护方法不当,一个个毫不留情地弃我而去。然而,这盆身份卑微、曾遭冷遇的芦荟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活了过来。其实,我给它的只是一个能延续生命的花盆,而它给予我的则是满室的绿意和清新;我捡回它只不过是举手之劳,而它却能默默

奉献给我美的视觉。它那飒爽的英姿,直让我目光禁不住凝视起来,久久不愿离开它。我对它生出一份敬意来——生命可以不高贵,待遇可以不优厚,而它生活的姿态却昂扬向上。

那年春节,我和老伴滞留乡下老家过年,一待就是二十多天。因无人照料花卉,我又没有对它们采取保持水分的措施,回到县城时家里的花草草几乎无一免遭干枯的命运。

只有栖息于屋角的芦荟虽惨不忍睹,却留有一线生机。看着它枯萎的样子,仿佛一位大病初愈的患者,显得弱不禁风。老伴竖看横看执意要把它扔到垃圾箱去,出于怜悯之心,我对老伴说:“留下吧,死马就当活马医!”面对苟延残喘的它,我精心地照料它,依照它喜光、耐半阴忌阳光直射、需要充足的水分但不耐涝、注意通风的生长习性,它没有辜负我的精心呵护,过了

一段时间,先是抽出长长的花茎,而后萌出一个个绿色的花蕾,由最下面的花朵开始,依次向上开放,变成可爱的橙红色。每有客人来访,进屋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冲着它说:“这是什么花?长得真好!”而它呢,正寂寞地待在那个角落默默地、葳蕤地生长着。

虽是秋日,太阳也有毒辣的时候,当烈性的阳光把它晒伤时,我只要浇点水,它又照样活得有声有色。望着它那不计宠辱、坦然大度的样子,我心中总会生出不尽的爱怜和仰慕之情。

我常想,花犹如此,何况人乎!一个人如果能像芦荟那样,即便生逢秋季,也能战胜逆境,顽强地生长,也就无悔于自己的人生。

十日谈

都市秋景

责编:殷健灵

偶然间读到奥地利诗人汉斯·雅尼什的一首诗《礼物》:“我要送你/一个核桃壳//里面可以有各种东西/大海/雪/一阵风/一朵云/葱绿的草/彩色的石/一块方巾/你的影像/寂静/我要送给你/一个核桃壳//里面是空的/也是满的。”

闭上眼睛,想象一个核桃壳,里面有蓝色的海,有洁白的雪,有流动的风,有变幻的云,形成一个辽远而

核桃壳

周春梅

优美的动态世界。接着诗人将视线聚焦于葱绿的草和彩色的石,又转移到方巾,然后是“你的影像”。也许“你”是一个美丽的女子,而那块方巾,曾经点缀她如天鹅般优雅

的脖颈,随着她轻盈的步伐,在风中飘扬,也在诗人心间飘扬?最终,一切归于寂静。这寂静,正对应着核桃壳的空,别有趣味。

我曾与一位朋友讨论过这首诗。我觉得如果诗到“寂静”结束,戛然而止,是东方式的留白;到第二次出现的“核桃壳”结束,则形成一个闭环,回环往复,正如同一个“圆满”的核桃壳。这样说来,诗歌最后的“里面是空的/也是满的”似乎强调得有些多余。朋友则认为,这样的强调,本身也是一种“满”,正好跟核桃壳的“空”形成一种对比。

因为这首诗,又想起童年时,乡间难得有核桃这样的美食,偶尔得到几个,妈妈会用锤子小心地敲开,剥出香香的核桃仁,放在我小小的手心里。她一边剥,我一边吃,我吃得比她剥得快,等待让核桃仁的香气变得分外浓郁,此刻的我,似乎还能嗅到那特有的浓香。

那些核桃壳的碎片,在我的回忆中也重新拼接成一个完整的核桃壳,里面住着童年时那个小小的我。明天,我要给远方的妈妈寄一条美丽的方巾,还有一盒香脆的核桃仁。

打开这本教科书时,仿佛当年那个“偷书少年”,正从时光的深处走来……

富锡金注定要与教科书结下不解之缘。懵懂年少时,他是忠诚的“守护者”;到了桑榆之年,他是热忱的“传播者”。他怀揣历史教科书,四处奔走游说,创立了富弼研究会;他将《宋与夏辽和战》等课文改编成剧本,搬上舞台。不仅如此,他还以“富弼讲坛”为平台,四处宣讲教科书的来历,宣传富弼的文化与功绩。每当他讲到“仁宗时,范仲淹、富弼尝有意改革,未竟而罢”时,

台下白发苍苍的族老们不禁纷纷拭泪——那些历史教科书上原本冰冷的铅字,此刻仿佛有了温热的生命质感。

富锡金与教科书形影不离,晚上睡觉也要枕着它入眠。那年深秋的一个上午,他提着装有教科书的帆布袋去某广告公司办事。当他人寒暄时,身边的帆布袋竟不翼而飞。“我把老祖宗弄丢了!”他——

一个六七十岁的大老哥们,在派出所声泪俱下的哭喊,让民警们既困惑又动容。通过监控回放,终于在垃圾站找回了被清洁阿姨误当废品清理的书册。

如今,这部教科书被供奉在老祠堂的檀木匣中。它早已不是一本普通的历史读物,而是富氏族人追念先祖的文化信物,或者说是一种精神图腾。从中,他们能够真切地触摸到富氏繁衍的脉络,体悟老祖宗的家国大义与高洁品格。富弼关于“以民为本”“忠和治世”的训诫,已然化作可触可感的文化基因,在血脉中代代相传。

当祭祖的袅袅青烟渐渐漫过老祠堂的飞檐,供桌上的历史教科书在摇曳的烛光中轻轻翻动。那些沉睡百年的铅字,在忽明忽暗的光影之间慢慢苏醒,仿佛正在续写一个跨越千年的家族传奇。

